

城市建设随谈

李瑞环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读《随谈》的随想

——《城市建设随谈》代序

我在北京工作已四十多年，天津与北京相距一百几十公里，也许因这个城市过去对我没有什么工作联系的缘故，每次过往匆匆，可以说对它并不熟悉。这些年来，听说天津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注意起来。1986年赴津开会，回北京前，送我去车站的司机同志（一位老天津）主动对我说：“现在离开车还富余近一小时，容我带你到有些地方去看一看吧！”我当然欣然从命。他一面指点，一面津津乐道：这些年哪些地方、如何变了样，等等。一种热情、自豪感和对未来的期待，对我这个长期从事建筑和城市研究的人来说，触动和鼓舞很大。从此，总想抽出点时间对天津的建设多作些了解。

《天津城市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组把天津市长李瑞环同志这些年来关于城市建设的手稿和谈话记录选编成书，乘来京之便把清样给我看了。我以浓厚的专

业兴趣阅读了它,好像对近些年来天津的建设过了一次电影。《随谈》很实在,语言生动,内容具体,又有哲理,读了很受启发。情不自禁地写了如下四点随想:

第一,“一切为了人民”,这是天津城市建设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回归点。

“为群众排忧解难”、“为人民办实事”、“要人民得到实惠”……在《随谈》中贯彻通篇,意义深刻。本来,“安居乐业”从古代起就是历代社会政治家的基本理想和老百姓的期望。道理也很简单,人民只有“安居”,才能“乐业”,也才有社会的安定。但真正做到又谈何容易!为什么历史上的“循吏”修了一个堤堰,挖了一口井,就流传千古,至今仍为美谈?就是因为它难能可贵。当今的城市,安居的问题比历史上复杂多了,在我们的一些城市里,至今也并未完全解决好。很难想象人均位不到三平米,大男大女、三代同住一间屋,在抗震棚中,夏顶烈日、雨天泥泞,人们怎样安居?何况“安居”不光是有了住房就行,生活在今天密集的大城市中,没有可喝的水(“自来水腌咸菜”),没有“排水系统”(“污水四溢”),交通不便(“坐车比走路慢”),妈妈下班赶不到幼儿园,孩子举着小手、哭哑了嗓子要妈妈……老百姓如果随时随刻要为基本生活问题困扰不安,又如何能够“乐业”?《随谈》对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观察得具体入

微：“在你或许都是小事，但在每一个碰到这些问题的老百姓就是大事”，问题一天不解决，他们会一天遭痛苦；在道理上作者讲得很深刻：“人民政府必须为人民服务”，这是“民主的实质”；在工作上天津抓得很得力：强调“实事求是”，这些年他们每年为改善人民生活办的实事，百分之九十都与城市建设有关，而且都通过建设得到了落实。例如经过周密研究，抗震棚说拆就拆，引滦工程说干就干……许多事情说到做到：包括“换房、修房”，“施工不扰民”等等，都想得相当周到，使长年积存的老大难问题，一个一个地得到相应的缓解。正因为政府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千方百计地解决了一批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群众生活难题。不断地改善了人民工作和生活的环境，真正为人民办了实事，老百姓受到了实惠，所以尽管目前还存在这种那种困难，但群众“有了盼头”、“长了劲头”，他们理解政府，就能“为政府作劲”——生活抓好了，生产也上去了；城市建设为了人民，又回过来从人民群众中得到了支持、信赖、合作和力量。《随谈》中一再引用天津人的话“得仙气”，这是很值得回味和思考的。

第二，城市建设要能较快地取得实效，必须要有切合实际的战略战术。

天津是一个老城市，原来是九个租界加上老城，各

自为政,畸形发展的一个混合体。50年代以来,又以“挖潜”为主,城市建设一直没有提上日程;“文革”中又破坏严重,再加上1976年大地震,天津确实是满目疮痍,难以为继了。欠帐是这样的多,“城市病”随处可见,假如任其恶性循环,后果很难设想。一切是那样的急迫,如何扭转这种局面?真是困难重重,谈何容易!读完《随谈》,我感到这些年天津的建设简直就像打仗一样: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是靠千军万马奋战出来的。当然,每一仗都亟需要指挥员的胆略和全民的拼搏精神。但是,正确的战略战术尤其是关键。我觉得这里面有不少理论和实践值得认真总结。例如:

——把规划与计划统一起来。这是老问题,我们长期未能很好解决,而天津却有力地做到了。他们的“计划围绕实现规划”,协调了城市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由于市长把规划放在应有的重要位置,要求既符合实际,又有远见,每年措施落实得具体,使工作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把最迫切的基础设施问题放在首位。基础设施问题是近代城市功能的发挥与运转必不可少的物质要素,又是生活、生产所系,是忽略不得的“支持系统”。而我们多少年来却不顾后果地“欠债”。事实上,这方面欠多少债,政府就背多少包袱,老百姓就要多受多少痛

苦,债一日不还,罪一日不完,并且无论拖多长时间,欠债终是要还的。因此,迟还不如早还,早还可以早见效益。在这方面,天津战略上思想明确,战术上集中兵力,“既然是重点工程,就应该真正成为重点”,部署周密,指挥精心,半年、一年、至多两年,干净利落地拿下一套套工程,解决一事实实际问题,缓解了一堆堆矛盾……这在震后满目凋零、百废待兴的天津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干得很出色的,既锻炼了队伍,鼓舞了士气,也动员了人民,“人民城市人民建”才不流于空谈。当然,说“打仗”,不过是一个比喻。速战速决和日常工作的法律化、制度化是城市建设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辩证的统一。在两个方面天津都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值得总结。当天津的基本情况得到相当缓解之后,已经得到的建设成果就亟需要完善的管理和法制加以维持和巩固,并且将已经开始的群众参与规划的方法继续推进,在需要与可能、理想与现实之间,不断地保持一个协调的关系。

第三,坚持业务理论探求和哲学思想的引导是天津城市建设的一个特点。

正确的战略战术,必须建立在业务理论和哲学思想的引导之上。我觉得《随谈》的特色,在于作者结合自己领导的城市工作实践,如此认真地探索理论问题:从研究城市科学与作好城市领导工作的关系,到城市人

民政府的基本任务与做好城市领导工作的重要原则；从城市的布局到规划设计、城市住宅的改造与建设、城市建设的组织施工，到城市环境的保护与综合治理；从城市美的追求、城市文化与精神文明的建设到城市建设和管理体制的改革，等等。可以说有关城市建设问题的各个方面几乎都有探求，并有着自己见解（尽管有些具体技术问题，不同的意见在我们同行中也偶有所闻，百家争鸣，这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难能可贵之点在于对理论研究的重视和建立在哲学思想上的思考。

（一）关于综合与分解

——《随谈》的作者，从天津的实际出发，比较自觉地用系统观念认识城市，强调“综合地”、“协调地”处理各种关系，解决纷繁的城市问题——综合的目标，综合的方法，综合的效果。反对孤立地就事论事地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用作者的话说：“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这是很有见地的。例如某些工程的建设，实际上已取得了一举多得”的综合效益。这种思想方法，是近代科学的方法论提倡的“整体思维”（Holistic thinking），这是我们处理如此错综复杂的城市建设问题必须具有的思想方法，它有助于我们视野开阔，思想活跃。

——城市建设问题总是多种矛盾的交织，“剪不断、理还乱”。因此必须认识、运用事物矛盾的规律，加

以具体地剖析、分解,找到解决具体矛盾的钥匙。天津把每年实现规划的计划措施具体落实到“十件”“二十件”大事上来,这样,城市的总体规划不再是纸上画画,墙上挂挂的“美丽的幻想”,或者像通常近代城市规划理论对城市物质规划的批判(包括有些外国对我们规划工作的批评)所谓“终极状态的蓝图”,而是化为一系列得到落实的近期建设的具体措施,促使近期建设不断地滚动前进。这倒使我想起《庖丁解牛》寓言的启示,如何善于精确地分解和有节奏地“奏刀”的艺术。哲学给人以智慧,《随谈》的启示说明,我们城市建设工作者尤其需要研究理论、学习哲学。

(二)关于物质与精神

——我们的国家很穷,基本建设资金缺乏,而城市建设必须要耗费大量的物质财富,这是谁都承认的事实,问题是如何对待它。天津的工作,在于千方百计将这有限的资金作合理的安排,干关键的事情,产生较大的效果,例如如前所说的多为“当前和子孙后代办实事”,兴“雪中送炭”之举,力戒华而不实“惊人之名”;并在各方面挖掘潜力,厉行节约,“重点工程重点节约”,综合经营,各方配合,加快速度,缩短工期,杜绝拖延工程造成的巨大浪费,等等,这些都可得到积极效果。《随谈》还说明了,我们做工作,不仅见物,还要见人,要看

到人的力量和作用,群众的干劲和创造力,关键在于如何唤起人民群众自尊、自信、自强的精神,与政府同心同德,建设人民的城市,而这种力量如果真正地调动起来,却是非常伟大的。这就是“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办群众之所需。为政者如能作到这点,就能取信于民,得到群众的拥护与支持,为“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创造出“共同的业绩”,足见精神的力量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精神的富有可以克服物质的贫困。处理好以上两者关系,那么“两个文明一起抓”就不属于空洞的口号,城市的建设就不仅仅是物质的建设,还是改造社会、树立新风的精神文明的建设,意义就更重大,内容就更充实了。

第四,推动城市科学在全国开花结果。

多少年来,通常有这样的作法:某地某单位某项工作出色,于是有关部门召开一个现场会,议论一番,总结几点加以推广,如此而已。这种工作方法当然不能全盘否定,但就笔者观察,如果就事论事,就难免刮“风”,容易使生动活泼的创造僵化起来。搞“一刀切”,对其他地方只会窒息他们的自我创造。

中国的城市都是同一历史时期经济社会背景下的产物,有它的共性。例如城市财政都很拮据,基础设施

大量的欠帐，市政当局被一系列棘手问题捆住手脚，捉襟见肘，疲于奔命。当然不少城市这些年都有一些建设，在不同方面也有一定改善，但问题积重难返，很难希望在短期内有较大变化。正由于这样，需要相互学习和借鉴。但从另一方面看，各个城市又各有其特殊性，并且应当看到既有困难的一面，又总或多或少有它潜在的优势一面。因此，城市建设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要靠各自努力自觉地研究，发挥创造性，探求自己的模式。瑞环同志是个非常用心的人，他又是我们土建这一行出身的，担任过不少重大工程的指挥，对于城市建设当然更熟悉些，有其独到的见解。但是从事其他专业的市长，也有其他优势，也必然各有不同的工作方法和风格。更为重要的是，首先要充分认识城市科学的重要性，大力提倡和运用城市科学。近代的“城市科学”在我国发展时间很短，而这门学科本身又还有它的不成熟性，但是如果一个城市能够在有关市长带领或支持下，有较多的专业人才共同研究，并将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东西进一步总结提高，相信城市科学必将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城市建设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也必然会有一个较大的提高，而我们不愿看到的蛮干、乱干的情况就可以减少一些，并且在资金拮据的困难条件下，也会把钱用得更恰当些，效益发挥得更有效一些。归根

到底,让老百姓可以得到较多的实惠。

再者,城市建设是地方事业,必须更寄希望于地方来发挥创造。中国城市科学的发展,归根到底要在地方开花结果。如何使国家政策化为地方的方针与措施,这就要求地方在对一般规律认识的基础上,研究各自的特殊规律,这是非常必要的。天津的经验以及其他在建设上取得了这样那样成绩的城市的经验给我们的启示,就在于从城市发展的目标,到地方科学队伍的组织,对不同地方不同规划设计模式的探求,地方风土文化到艺术风格的形成等,都是可以找到自己的路子和可以有所作为的。如果我们全国各个城市都有不同的发展创造,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能得到一定的保证,环境质量能得到一定的改善,则具有中国城市建设的特色(包括城市功能特色、工作特色以及它的艺术特色等),必将逐渐形成和发展。这是我们长期向往,并要共同为此努力的。

吴良镛^①

^① 吴良镛教授系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世界人居学会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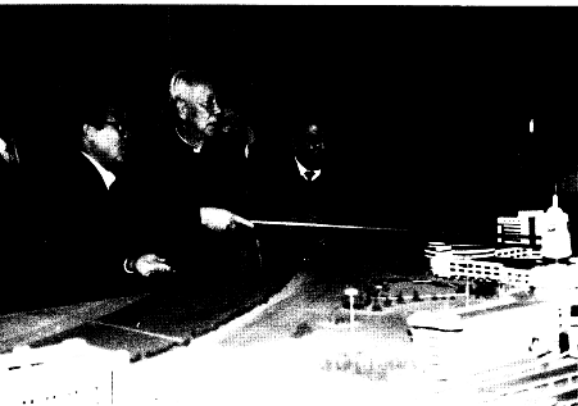
作者像



△ 作者陪同邓小平
同志视察武汉立
交桥



◁ 作者陪同邓小平
同志视察天津经
济技术开发区



△ 作者陪同万里同志审查天津站设计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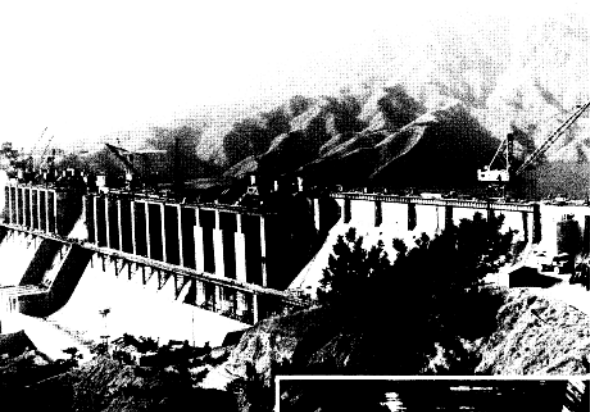
▶ 作者在现场勘察
“十四射”路线

< 作者参加平房改造义务劳动



▽ 作者参加引滦工程
义务劳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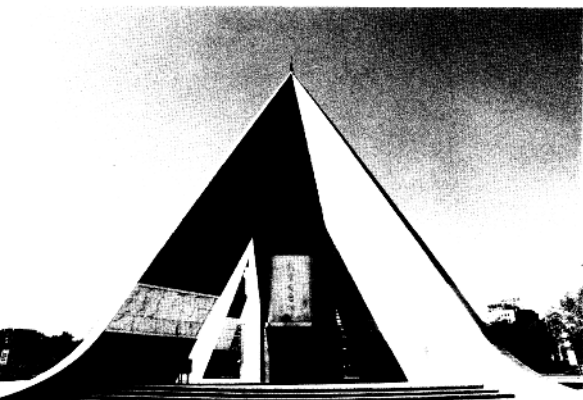




△ 潘家口水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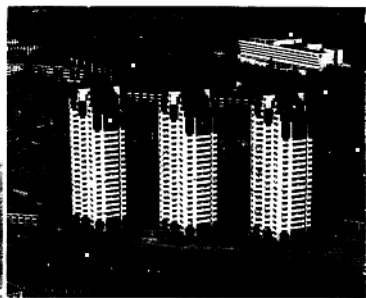
▽ 引滦工程输水隧洞



△ 抗震纪念碑



▽ 地震后遍布城区的临时棚



林院北住宅区